

编者按:无论我们对秘书学的现状作何评价,都不可忽视在此领域众多先哲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绩。总结前人的成果,汲取其中的思想精髓和经验教训,是学术研究不断攀升的阶梯。然而,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秘书学研究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自觉地“站上巨人的肩膀”。本期推出“秘书学史研究”专题,一方面展示前人的种种努力,另一方面希望吸引更多人重视本学科的历史传承。专题中的三篇文章,《论秘书学史研究》《徐望之“公文尚散文”辨——兼谈古代公文写作对骈散之争的消解作用及其启示》《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有的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有的小处着手、追本溯源,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两位青年作者治学的态度和钻研的深度,让我们看到学科发展的希望。

论秘书学史研究

杨剑宇

【摘要】中国秘书学史是研究中国秘书学自身发展进程和学术思想的专门史。文章论述了秘书学史研究的范围、内容、分期、基本方针、基本方法、切入点、科学性问题。

【关键词】秘书学史;学科发展史;学科学术思想史

一、问题的提出

秘书学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归纳成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握规律,指导教学、科研和秘书工作。能够系统地研究学科自身的发展进程,也是学科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有同行提议对

中国秘书学史开展研究。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董继超 1989 年在其主编的《公务秘书学》^[1]中也提及此问题,1995 年在《秘书学史研究刍议》^[2]一文中再次提出此问题。笔者遂撰文表明看法,认为当时秘书专业存在仅十几年,缺乏积累,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宜等到积累较丰厚之后再开展相关研究。^[3]此后争论停歇,问题也就搁置了。

作者简介:杨剑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史、国外汉学、秘书学。

20多年过去了,如今,对秘书学史开展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初步具备。一则,秘书学专业已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至今已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此专业,还有近10所高校设立了硕士点,1所高校设立了博士点,相关科研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二则,大批拥有博士学位、博士后经历的中青年加入了秘书学专业师资队伍,他们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和动力,也想学习、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史、学术思想史;三则,有的高校已组建专门团队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开始涉足秘书学史研究。因此,笔者拟就此研究课题谈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对秘书学史研究有所帮助和推动。

二、秘书学史研究的范围

中国秘书史是研究我国历代秘书工作现象和规律的专门史;中国秘书学史是研究中国秘书学自身发展进程和学术思想的专门史。从整体上看,两者研究的范围、对象、内容是不同的。

笔者认为,中国秘书学史研究的范围应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中国秘书学科产生和发展至今的历程,即学科发展史;二是各种观点、流派的产生和演进,即学术思想史。秘书学科产生和发展至今的历程,是秘书学科学术思想产生和演进的渊源,而形成共识的学科学术思想,又是指引和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这两部分内容相辅相成,在秘书学史研究中水乳交融、缺一不可。

1. 学科发展史部分

建议将上世纪80年代初秘书专业的诞生作为起点,因为专业诞生后才有了学科。笔者将这近40年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专业产生和兴盛的前15年(1980年—1995年);第二阶段,历经坎坷的后15年(1996年—2010年);第三阶段,专业升格为本科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2011年至今)。

第一阶段,“十年动乱”结束后,高校恢复招生、教学和科研,老专业得以重建的同时,一些

新专业纷纷设立。社会需要秘书人才,秘书工作者希望将经验引入高校,加上国外高校秘书专业的影响,秘书专业在我国高校骤然兴起。一时,全国先后有400多所高校设立此专业,中国高校秘书学教学研究会成立,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大量著作、教材、论文问世,秘书类专业期刊在全国遍地开花。^[4]

第二阶段,在1998年的全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大调整中,一批高校申报秘书学专业本科失败,学科发展急剧滑坡。学界有识之士鼓舞士气、积蓄力量、迂回前进,经百般努力,使秘书专业在自学考试和成人教育中成功升格为本科,经教育部批准,20多所高校设立了文秘教育专业本科。这些发展使学科建设向前跨进了一步,为申报全日制秘书学专业本科奠定了基础。^[5]

第三阶段,在有识之士的呼吁、组织、奔波下,秘书学专业于2012年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此后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2010年以来,同仁们先后八次召开专业建设研讨会,研讨专业发展面临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对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师资建设、实训室建设、学术发展、内涵建设、考核评估等进行梳理。其中,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有的问题正在解决,有效推动了专业的发展。^[6]

2. 学术思想史部分

这部分研究范围的内容则可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分析、评价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秘书学观点、思想、论文、著作;第二,探究秘书学思想的源流与派别,以及影响、作用、地位;第三,对秘书学人物的贡献、学术风格、特点、地位进行评价;第四,溯寻秘书学本身发展的脉络,揭示其规律;第五,考察秘书学知识的积累过程和表现方式、技巧。

关于学科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这两部分内容的研究,前者明显易于后者。这是因为前者的时间跨度只有近40年,资料多且容易收集,三个阶段的分期脉络清晰;后者的时间跨度长达

几千年,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充分,分期脉络也不清晰。

三、秘书学术思想史的分期

秘书学术思想在秘书学科诞生前就已存在,其源头可追溯到古代,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而不是近40年,关于它的分期也有过争议。上世纪90年代中期,董继超撰文《秘书学史研究刍议》,将秘书学史(即秘书学术思想史——笔者注)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孕育阶段、萌发阶段、准备阶段、开创阶段。^[2]《秘书》杂志原副主编刘耀国也持类似观点,划分出史前阶段、萌发阶段、准备阶段、开创阶段,还划定了每一阶段的具体起止时间。^[7]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且不说“孕育”“萌发”“准备”“开创”诸词词义的差异,也不说秘书学术思想史是否已成熟到能以细微差异来划分阶段,更不说具体起止时间的划分,只说分期的基础,笔者就认为远未具备。

第一,马克思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8]秘书学术思想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一门专门史,自然也是事后回顾、反思的。关于秘书学术思想史的分期,只有积累了大量“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才能开始“思索”;勾勒出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才能开始作“科学分析”。然而,别说20多年前,就是目前,我们所积累的史料也还远未丰厚到足以成史的程度。秘书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尚未明朗,其历史轮廓仍不清晰,靠已掌握的史料只能勾勒出历史的局部。对于一门专门史,只有看清了它的全程、全貌,顺流而下或者溯流而上予以仔细考察,方有可能按一定的标准将它划分成段,否则论断就缺乏雄辩的依据和科学的标准。

第二,董继超在文章中也写道:“秘书学史的分期必须从秘书学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出

发,去研究秘书学的起源、产生和发展,从中确定各个发展时期的起止年代和重要表现。”^[2]那么,“秘书学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以及“秘书学的起源、产生和发展”已经被揭示、梳理清楚了吗?笔者认为,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既然没有,也就无从“出发”去“确定各个发展时期的起止年代”。

第三,在社会科学中,没有一门学科的学术思想史的分期是在研究者们欲着手研究时就可以划定的。更有甚者,有的学科已相当成熟,但是一提到分期问题,研究者们依然争论不休,言人人殊。秘书学术思想史只是一门处于设想阶段的、尚未诞生的专门史,要对其进行精确到年的分期,实在缺乏基础。学者们的探索精神诚然可嘉,但是,基础缺乏,结论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历史分期,是人们观察和研究历史过程时寻找的一种方法,一个大致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一个关键时期的节点,同时又不可以看得太绝对。”^[9]所以笔者认为,秘书学术思想史的分期宜粗不宜细,可以沿用历史时期的通常划分法,将其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大的阶段。

四、研究秘书学史的基本原则

笔者对中国秘书史的研究,采取了厚古薄今的基本原则,其理由见拙作《中国秘书史》^[10]。但对秘书学史进行研究,包括学科发展史研究和学术思想史研究,其基本原则却得厚今薄古。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古籍中有关秘书现象的记载寥若晨星。笔者在撰写《中国秘书史》的过程中,曾从二十四史等史籍中搜寻史料,但所得甚少,深有大海捞针之感,而有关秘书学史的史料更为罕见。严格地说,我国在18世纪中叶以前并没有秘书学专著和系统的秘书学学术思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是构筑秘书学史大厦的砖石,砖石无几,大厦难筑,因此秘书学史研究的重点不可能是古代,无法厚古。

第二,18世纪中后期,《幕学举要》《佐治药

言》等秘书学著作先后问世,1884年,这些著作被辑录成《入幕须知五种》,从历史分期上来说这时已属于近代范畴。而在《入幕须知五种》汇编的八册书中,《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三册偏重于论述从政施政、为官治民之说,《办案要略》《刑幕要略》两册偏重于介绍和传授办案经验,虽然内容与秘书工作有关联,但将它们分别划归领导科学著作和法学著作似乎更为合理。称得上秘书学著作的仅《幕学举要》《佐治药言》和《续佐治药言》三册,史料仍显单薄。因此,秘书学史研究的重点也难以置于近代。

第三,现代,我国出现了两次秘书学研究高潮。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当时的政府对秘书工作进行过多次改革,既总结国内秘书工作经验,又派员赴欧美考察,并建立起相应的学术团体,创办刊物,对以文书档案业务为主的秘书工作开展学术研究,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秘书学著作,如徐望之的《公牍通论》、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周连宽的《档案管理法》等,掀起了我国现代首次秘书学研究高潮。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秘书专业的诞生,我国再次掀起秘书学研究高潮,且延续至今。就地域而言,研究从北京、武汉、四川、东北、华东的一些点,迅速向全国扩展;就参与者层次而言,从党政机关秘书部门的高级领导,到大专院校的教师、学者,乃至基层单位的秘书人员,各个层次均有人参与,声势浩大;就研究领域而言,从党政秘书研究起步,延伸至企业秘书研究、涉外秘书研究、行业秘书研究、乡镇秘书研究等;就研究内容而言,从直观描述秘书实务、交流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探索,涉及秘书和秘书工作的定义,秘书的职责、作用和地位,秘书工作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派生出了秘书史、外国秘书工作、秘书心理学等研究分支。

至今,全国已有100多所高校设有秘书学专业本科,有上海大学《秘书》杂志等多家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还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提出了众多有价值的观点,有的已初步形成了

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研究者们围绕一些热点论题展开讨论、争议、论战,客观上出现过学术流派的雏形,涌现出一批学术代表人物,产生了一批秘书学专家。同时,国内秘书学界与国外秘书学界也建立了联系,开展学术交流。

近40年,秘书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秘书学研究的鼎盛局面,为秘书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扎实的基础。因此,秘书学史研究的重点只能置于现代,其基本原则只能是厚今薄古。

五、秘书学史研究的切入点

对一门专门史进行研究,最初总是从零碎的、分散的、微观的探索开始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个案至全貌,集腋成裘,逐步完成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而构筑起专门史的框架。选择切入点,是探索的起步。秘书学史尚无自己的史料学,只有纵观各时期史料的概况,才能选好切入点。

我国古代关于秘书活动的见解零散而不成系统,多记述而缺乏抽象概括,多罗列现象而缺乏总结归纳,常常夹杂在探讨其他社会活动规律的过程中。所以,古代少有秘书学专著,对秘书活动的论述往往只有只言片语。“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1]这是明成祖朱棣对秘书机构——通政司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封建帝王对朝廷秘书机构的重要作用及其地位有一定认识。“吾子历览古今之变,而通其得失,是将植密画于借箸之宴,发群谋于章奏之笔,上为明天子论列熟计,而导扬威命。然后谈笑樽俎,赋从军之乐。移书飞文,谕告西土劫胁之伍,俾其箪食壶浆,犒迎王师,在吾子而已!往慎辞令,使谕蜀之书,燕然之文,炳列于汉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琐琐者,恶足置齿牙间而荣吾子哉?”^[2]这是唐代柳宗元在送好友赴任秘书官职时的赠言,反映出封建士大夫对秘书的素养、职责范围、作用、地位的看法。

这类言论属秘书学史的史料,值得归纳、研究。然而,由于它们零散无序,我们无法将其作为学科研究的切入点。

有学者提出将《册府元龟·幕府部》视为我国古代秘书理论体系的草创,但秘书学界对此普遍不予认同。^[13]笔者认为,《册府元龟·幕府部》中的总序、小序只是关于宋代以前官府秘书工作的一般性描述,而不是思想理论性文献,更称不上是理论体系。它可以被我们当作中国秘书史研究的史料,但不能作为秘书学史研究的史料,自然也无法作为学科研究的切入点。

近代出现的《入幕须知五种》这一包括秘书学专著在内的丛书,可供仔细研究。现代,论著众多,观点、见解纷呈,资料充足。

秘书学界的一些同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清代幕学和幕学著作作为秘书学史研究的切入点,笔者认为,这一选择是适当的。这是因为:第一,清代幕僚盛行,绍兴师爷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幕学(秘书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运而生,以此为切入点,影响大,利于吸引学者参与讨论,造成声势;第二,《幕学举要》等幕学著作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秘书学专著,书中的秘书观点显然比古代的只言片语要系统、全面,便于学者研究;第三,将此作为切入点,便于上溯下探,连贯全线,构筑起专门史的基本框架。

按照问世的时间先后,与这一论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章主要有:郑天挺的《清代幕府制的变迁》^[14],杨剑宇的《清代幕僚探讨》^[15],张先贵的《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16],刘春萍、陶建平的《〈佐治药言〉中秘书学哲理探幽》^[17],刘耀国的《秘书科学萌发与清代幕学专著——兼与董继超等先生商榷》^[18]等。此外,少数秘书学著作对此也略有涉及,有的同仁比如天津的杨文起对《入幕须知五种》作过初步的介绍和整理,可惜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但是,上述文章对清代幕学和幕学专著的探讨,多数尚停留在对其背景、成书年代等的考察层面,还未深入挖掘其实质,即未对其秘书学

观点或思想进行梳理、归纳、提炼,也未对其价值、影响作出评价。因此,尚需逐步深入、触及实质地进行剖析评判,作高质量的研究,让这一论题真正成为切入点,并为秘书学史研究树立个案研究的样板。

六、研究秘书学史的基本方法

研究中国秘书学史,需要打好两个基础,掌握两种方法。

1. 两个基础是指秘书学和历史学

秘书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是依据秘书学的涵义划定的。历代古籍浩如烟海,判断其中哪些言论、论文、著作、观点、思想属于秘书学范围,需要以秘书学的概念、原理为标准进行分辨、甄别、挑选。所以,研究者必须先认真学好秘书学,透彻理解其内容,方有能力研究秘书学史。

中国秘书学史是研究中国秘书学发展进程和学术思想的专门史,是历史学和秘书学相互交叉、渗透的一门学问,所以它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它不但研究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还能与其他学科结合,揭示各种具体社会活动的历史过程,形成专门史。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中国史学博大精深、成果丰硕,利用其成果来研究秘书学的发展进程和学术思想,就形成了秘书学史。秘书学史在形式上采用历史学的分类叙述法,在内容上则以历史上秘书学范围内的言论、论文、著作、观点、思想为研究对象,是传统学科和新学科相结合的一门新学问。

秘书学史的学科发展史部分和学术思想史部分,都是依照时代或年代顺序分章叙述的,涉及对各王朝、各时期历史沿革的深入了解;作为一门专门史,它的研究内容受历代政治制度、社会状况、思想文化等的制约。比如,为什么幕僚在清代盛行且作用重要?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只有具备基本的历史知识,了

解历史上重大的政治制度、社会状况、思想文化等,方有能力研究秘书学史。

2.两种方法是指历史研究的方法和逻辑推理的方法

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是从纷繁的古代文献中搜集有关史料加以考证、鉴别、整理,然后开展研究。“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9]所以,首先必须从搜集、积累史料入手,以拥有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为研究基础。笔者认为,对古代,以搜寻史籍中的秘书学言论为主;对近代,以研究幕学及其专著为中心,积累成果;对现代,需要对大量资料进行甄别和选择。历史研究的常用方法是比较,比如,将某一时期的秘书学思想与前一时期的作比较,看其有何发展,为何发展,成功与失误何在;或与现代的作比较,看哪些思想被继承、吸收或已被改造,哪些方面需引以为戒。

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是根据一个或几个已知条件推导出结论的方法。在浩瀚的史籍中,有关秘书学的言论、观点、思想稀少而零散,难以直接反映出全貌,需要对这些史料进行甄别,从而推断出结论。由于搜集到的史料其价值各不相同,因此还需要寻找出典型史料作重点解剖,从中找出共性,揭示规律性的东西。

在社会科学之林中,对学科自身发展进程作系统研究并卓有成效的,当推历史学。历史学在研究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派生出史学概论、史料学、史学史等子学科,其中的史学史就是研究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进程和史学思想的。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史学史研究的成功经验,结合秘书学的实际情况来推进秘书学史的研究。

七、运用学界积累的成果

秘书学专业产生和兴盛的前15年(1980年—1995年),是秘书学学术理论研究的繁荣

时期。这一时期,学科理论攀上一个新台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此后20多年,秘书学学术理论研究基本停留在原先的层面,无力向上攀登,呈现高原现象,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实现超越。在1980年至1995年期间问世的大量论著中不乏学术含量高、社会影响大的成果,比如,有的著作从基层往上逐级申报评选,荣获国家级奖项,有的论文被《新华文摘》等权威刊物选登。^[20]从研究领域看,从起初的秘书的定义、分类、性质和角色特征,扩展到秘书的功能、地位、价值和秘书的素质,再扩展到秘书工作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规律,秘书学科的架构体系、地位、类型、归属,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又扩展到中国秘书史、国外秘书工作、行业秘书工作、对秘书学者的评论等,层层推进,研究领域日益宽广。这一时期还在秘书的定义、秘书工作的本质属性、秘书工作的规律、秘书学的架构等问题上进行多次讨论,也掀起过学院派(天派)和实务派(地派)之间所谓天地之争的论战。这15年积累了较丰富的学术成果,后面的20多年也多少有一些成果。

这些成果以原创论著、论文集、手册、词典、专题汇编集的形式留存下来。比如,在探索秘书学思想源流与派别、影响、作用、地位方面,王千弓、徐中玉主编的《秘书实用手册》^[21],收集了当时已基本达成共识的有关秘书学的各种概念、观点,全书近47万字;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何宝梅的《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22]对每个重要概念、观点的不同见解进行梳理,全书23万字。又比如,在秘书学人物评价方面,重庆商学院副教授邱惠德历经数年全国秘书学界进行采访调查,根据学术成果、价值、贡献、影响,推出了李欣、王千弓、常崇宜、董继超、方国雄、杨剑宇6位秘书学家,为之立传。其撰成的《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23],还介绍了一些活跃在秘书学界的青年学者,全书近23万字。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参考资料,应予收集、借鉴。要以前人的终点为起点,来研究秘书学史。

八、秘书学史研究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一门专门史的生命。为了确保科学性,秘书学史在起步时就应当注意四个问题。

第一,对秘书学的每一则言论、每一部著作、每一篇论文以及每一个秘书人物均须花功夫仔细研读、考察,作准确、全面的理解,然后深入分析、研究,如此才能作出基本准确的评价。倘若走马看花,甚至未读原文、原书就急于评判,自然失之偏颇,缺乏可信度。

第二,对现代秘书学观点、思想不宜作跟风式评价,而应该经过冷静思考后再作鉴定。有的观点已基本成为共识,如秘书的辅助性特点;有的尚存争议,如秘书的定义、秘书工作规律、秘书学研究群落等;有的一时不为人接受、重视,日后却可能为学术界公认;也有的昙花一现,或轰动一时,随后消散。历史研究是一种回顾和反思,凡此种种,研究者只有待其沉淀下来后,以冷静、公正的目光予以剖析、评判,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第三,笔者设想将秘书学史研究分为三类:将秘书学界已形成或基本形成共识的秘书学观点归为第一类;将尚有争议的归为第二类;将已

提出而尚未研究的问题归为第三类。先集中对第一类再作研讨,扩大共识面,使之成为秘书学史的基石。对于第二类,选择其中影响最大的说法用于教学和对社会作解释,而秘书学界内部可继续讨论,待有了更科学的说法再取而代之。这种做法有利于推进秘书学研究,也有利于提高秘书学的社会地位。对于第三类,选择其中的重要问题开展研究,以弥补前两类研究的不足。

第四,反对剽窃,端正学风。与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相比,秘书学界的抄袭之风令人吃惊,这不仅败坏了秘书学的名誉,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学术研究是十分艰苦的智力劳动,研究者要花大力气收集史料,甄别筛选,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推导,提炼出观点,再将一个个观点构筑成严密的体系,完成论文或专著。研究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杜绝学术不端。只有这样,才能使秘书学史研究走上正道,也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中国秘书学史的研究是秘书学界一项宏大而颇具意义的工程,也是一项艰苦的工程。希望有志之士积极加盟参与,群策群力,共同来完成这一工程。

【参考文献】

- [1] 董继超,主编.公务秘书学[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2] 董继超.秘书学史研究刍议[J].秘书,1995(4):40-42.
- [3] 杨剑宇.对秘书学史研究的思考[J].秘书,1995(12):37-39.
- [4] 杨剑宇.秘书学专业产生和兴盛的前十五年(1980—1995)[J].秘书之友,2017(11):4-7.
- [5] 杨剑宇.秘书学专业历经坎坷的后十五年(1996—2010)[J].秘书之友,2017(12):4-6.
- [6] 杨剑宇.秘书学专业建设进展与对策[J].秘书,2018(1):81-85.
- [7] 刘耀国.论我国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特点[J].秘书,1995(8):38-41.
- [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
- [9]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J].近代史研究,2005(1):1-29.
- [10] 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85.
- [11] 列传第三十五:解缙 黄淮 胡广 金幼孜 胡俨[M]//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

4120-4121.

- [12] 柳宗元.柳宗元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590-592.
- [13] 杨文起.关于《册府元龟·幕府部》的讨论及其他[J].秘书,2003(3):41-42.
- [14] 郑天挺.清代幕府制的变迁[J].学术研究,1980(6):66-68.
- [15] 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283-287.
- [16] 张先贵.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J].秘书之友,1989(8):7-8.
- [17] 刘春萍,陶建平.《佐治药言》中秘书学哲理探幽[J].秘书,1993(9):33-35.
- [18] 刘耀国.秘书科学萌发与清代幕学专著——兼与董继超等先生商榷[J].秘书,1994(5):34-36.
- [19]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27.
- [20] 王千弓,徐中玉,主编.秘书实用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21] 何宝梅.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22] 邱惠德.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